

序

邓 虹

今年春节期间,我与时平同学通电话时,获悉他主持的江西省社会科学研究‘十五’规划课题《方志敏思想与精神品质研究》即将出版,我很为他的成绩感到高兴。两个月后,我再次与时平通电话,得知他要将自己近年来发表的有关研究中国宏观战略及国际问题的文稿结集出版,我很是钦佩。时平就文集的结构与我进行了讨论,并要我给文集写一个序。我当时只是答应试一试,因为心里没有底,惟恐自己的文字不能对时平的研究进行恰当的评说。

时平比我年长,是我大学的同窗,也是大学毕业 20 周年后还常常与我有学术交流的好友。在我的印象中,他是友人之中为数不多的不讲贡献与收入之比的‘谈友’。在大学校门之外的 20 多年中,他一直专心于教学与研究。就他在党校的教研和领导工作来说,他本可以顺理成章地如大多数人所做的那样在老师们的文章中署上自己的大名,轻松地做到成果累累。但是,我所认识的时平并没有这样做。在我与他的交往中,他总是不忘问我又在研究什么课题,并要我将自己的文章给他‘参考’;我当然很乐意与他进行交流。他在介绍自己的研究成果时,总是忘不了要我给提点意见。令人感动的是,他总是虚心地听着我不成熟的意见。所以,我们同学之间的学术交流能一直不断。

说起时平的学术研究,我不能不提到在江西师范学院读书的日

子。在大学期间,我与时平不在一个组,上体育课也没能分在一起,但我们有共同的爱好,这就是学习英语。在大学两年的公共英语课学完之后,三年级时,系里开设了专业英语,全班 51 个人能坚持上完这门课的人不多,坚持到最后的只有我与时平两个人。有幸的是,上课的老师是 20 世纪 40 年代哈佛大学毕业的哲学家吴士栋博士,他上课的方式使我们充分领略到正宗美国哈佛启发式教学的好处。在这两年中,吴士栋博士引导我们通学了美国学者海斯、穆恩、韦兰所著的原版《World History》(《世界史》)教材。也许历史系的专业英语使学生们受到了某种熏陶,毕业之后从事学术研究并不断出成果的同学竟然是坚持修完这门功课的人。我认为这两年的专业英语学习为时平同学日后的学术研究打下了厚实的基础。

透视时平的学术研究,他涉足的领域比较广,古人提倡‘先天下之忧而忧’,忧的是一国之事,时平研究的着眼点更大一些,他忧的是世界之事,通俗地说就是‘天下事’,从学术的角度讲是研究国际政治经济问题和国际发展战略问题。用时平自己的话来说,就是“Focus on China and the world”(关注中国与世界)。从时平这本《关注中国与世界》的文集中,我们看到了他做学问的执著和研究的主要方向。

关于国际政治经济问题的研究,对平常人来说,有两个不易。一是能坚持下来实属不易。因为在市委党校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在材料的收集上很不容易,由于时平的勤奋和努力,这个困难被他顺利地克服了。例如,他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初,就发表了分析亚洲金融危机的系列文章,尤其是发表在国外的国际关系最高权威期刊《现代国际关系》上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对中国利用外资的借鉴意义》一文,资料之新,观点之新,令人耳目一新。还有他对目前世界上流行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这两种极端舆论的资料占有和研究分析,应该说是处于比较前沿的。二是从事这方面的研究立论不易,经得起检验的研究更不易。就这点而言,时平表现了较强的研究能力和较高的研究水平。在他研究中国国际战略的成果中,对毛泽东三个

世界理论的研究是最突出的亮点。就我所了解,国内学术界长期以来都把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归于毛泽东的首创。但时平没有囿于这个结论,而是依据翔实的史料和睿智的分析,于 1991 年在国内学术界第一个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理论不是毛泽东首创的新结论,论证了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是他通过对战后 30 多年的长期观察和独立思考而提出的伟大战略思想,辨清了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与国际流行的三个世界说的根本区别。时平的这一研究成果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关注,全国有十多家报刊给予刊登和转载,一些大牌的学者也引用时平的独到见解。

此外,时平生活和工作在上饶,他把为地方经济发展出谋划策当作自己的职责。我高兴地看到他在区域经济研究领域中也有不少很有见地的对策文章问世。例如收入文集的《知识经济时代江西怎么办》《积极探索工业化的有效途径》《论以企业为中心的工业化核心战略》《当前乡镇领导干部关注的热点问题》等文章,都是站在‘从全球着眼,从地方入手’的战略高度来认识‘世界与中国’的力作。在许多研究者看来,对策研究似乎不是学术研究,但时平却将学术研究与对策研究很好地结合了起来,为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时平的这本文集还有一个不能不评说的亮点,这就是他的世界眼光。把中国看成是‘The global village’中的一个成员,把江西、把上饶看成是世界链条中的一个环节,牢牢地把握住时代特征,这是贯穿这本文集的基本线索。在时平嘱我写序之后的日子里,恰逢“五一”休息,为了使自己的思路跟上他的研究,我利用这几天时间又将列宁在 1916 年春天写成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读了一遍。列宁在文章的开头写道:“在最近十五到二十年里,特别是西美战争(1898 年)和英布战争(1899~1902 年)之后,新旧两大陆出版的经济和政策著作,愈来愈多地用‘帝国主义’这个概念来说明我们这个代的特征。”牢牢记住这段话是意义重大的,因为从上个世纪以来,围

绕着‘时代的特征’这个问题引发的政论,在中国的发展战略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就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 1900 年之后的世界局势的论述而言,我个人认为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文是最重要的文献,列宁以他对资本主义本质特征的准确把握,在飞速发展的世界历史进程中,从大局上对世界的现实和未来做出了正确的判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使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有了主心骨。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的许多论述,我们现在看起来仍然是十分精彩的,依然可以指导我们今天的研究和工作,比如,在“生产集中和垄断”这一部分中,列宁认为“资本主义最典型的特点之一,就是工业蓬勃发展,生产集中于愈来愈大的企业的过程进行得非常迅速”。

据联合国贸发组织的统计,2000 年,全球 5 万个跨国公司占世界生产的 1/3,世界贸易的 2/3,国际投资的 2/3,国际专利的 2/3,拥有世界上 70% 的高技术和世界技术转让额的 80%。越向高端的交易活动,跨国公司的优势就越大,这种经济格局决定了我国等一大批发展中国家的进出口贸易难以在创新性的高新技术和高附加值产品方面有太多的贡献。

经过 100 多年的发展,世界资本主义生产集中的程度比起列宁时代要大得多,跨国公司在经济活动中的渗透度也强得多,也就是说“生产集中和垄断”作为列宁论述的“资本主义最典型的特点之一”没有任何改变。认识到这一个特点,我们便可以用“世界眼光”看待中国经济的地位。尽管中国在 2002 年已跻身于世界 5 大贸易国之列,但工业制成品出口结构仍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贸易的整体效益相对较低。按出口产品分类看,中国出口产品一半以上是来料加工,真正本国的产品还不到一半,许多外贸加工企业都是在为国外的跨国公司进行贴牌生产,这就是许多经济学专家所提倡的中国要成为“世界工厂”的真相。要改变我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只有在

科技创新上下工夫，这是发展中国家发展民族经济的必由之路。在论述‘生产集中和垄断’时，列宁还提到集中的程度达到了一些大垄断同盟可以对许多国家以至全世界所有的原料来源做出大致的估计，并且可以操纵的地步。如何认识这样的论述，在我们今天看来也是十分重要的。既然资本主义大垄断同盟可以垄断生产的源头，我们还要不要发展？面临着“单边主义”的挑战，我们又该如何应对？美英联军 2003 年的伊拉克战争是为了石油还是为了“反恐”？这些大是大非的关键问题，都要求我们站在世界的角度，将中国融入世界村去考虑战略问题。

列宁的论述中还有许多天才的预见，我不可能一一列举。列宁将世界作为个整体来认识，他是真正具有‘世界眼光’的人，他的研究给我们的启发是进入 21 世纪后，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去单独地发展，中国同样是这样，中国的发展已离不开世界。

正因如此，我想，任何一个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人也同样必须具有‘世界眼光’。了解到这一点，我们每一个读到时平这本书的人，能不为他‘放眼看世界，收眼看自己’的世界眼光而钦佩吗？我衷心地祝时平同学有更多的成果问世。

是为序。

癸未年 4 月 5 日草于青山湖畔之江西省社会科学院

作者的话

即将步入天命之年的我,回首人生,没有令人羡慕的在不同岗位上工作过的经历: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党校从事理论教学和研究工作。教研工作,从来就是一项艰苦的创造性劳动,必须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必须始终保持‘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 去留无意,望碧空云卷云舒’的淡泊心境。我曾经有机会离开党校,到沿海地区去发展,到党政机关去发展,但最终还是没有离开党校,没有脱离教研工作,而且一做就是 22 年。这些年来,得益于党校纯净的学术环境,得益于党校领导与同事的理解和帮助,得益于党校学员的鼓励和支持,使我能够焚膏继晷,埋头治学,煮字烹文,勤于笔耕,不经意间,共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学术论文 100 余篇 主编或参编并公开出版学术著作 15 部;参与设计并命中国社会科学基金课题 1 项,主持江西省社会科学研究‘十五’规划课题 2 项 获省部级优秀社会科学成果奖 16 项,其中一等奖 5 项、二等奖 2 项、三等奖 9 项。现在回过头来总结人生,我为自己没有选择离开党校而庆幸,为自己没有碌碌无为的人生经历而自慰。

作为一个在中观层次上进行研究的理论工作者,我在中国宏观战略及国际问题研究领域倾注了大量的精力,这既是一种爱好,也是一种理念的驱使。在大学读书时,我就专攻过现代国际关系史。及至在党校 22 年,我一直没有放弃对中国宏观战略及国际问题的关

注。

当今世界正处于大转折时期,多极化、全球化、科学技术发展高速化、综合国力竞争白热化已成为这次大转折的基本特征。冷战结束后,我们讲国际形势总体上趋于缓和,更大意义上是指大国关系的缓和。虽然两极对峙已经消失,只剩下一个超级大国美国,其他大国无意与之对抗,在可预见的将来世界大战打不起来,但整个世界并不太平,和平与发展这两个主要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并有了新的发展,不公正的国际旧秩序、恐怖主义等不确定因素继续增长,非传统威胁继续上升,单边主义的趋向令人担忧。经济全球化在给我们带来短缺要素、推进产业结构升级、扩大出口、利用外资等实惠的同时,国家的经济安全、主权等方面受到了新的威胁和冲击。科学技术正以一日千里的高速度迅猛发展,然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并没有充分享受,甚至完全没有享受到科技革命给人类带来的福利,南北之间居民的生活水平在拉大而不是缩小,人类面临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人口问题、资源问题、贫困和就业问题、经济风险防范问题、毒品以及新型疾病的威胁,等等。对于世界大转折中的这些新情况、新问题,任何一个国家、地区乃至每个人都要受其影响,都无法回避它的冲击。在这样的背景下,关注世界,就是关注自己。

早在1934年,胡愈之先生就说过:“中国是世界的中国。”正因为“中国是世界的中国”,所以每当国际体系发生重大变动的时候,中国内部也会出现深刻的变化。近百年来,国际体系发生过三次重大变化,都给中国带来了深刻的大转折。第一次转折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三国协约与三国同盟的矛盾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战后形成了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并引发了中国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中国开始了真正意义的民主革命。第二次转折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取得了胜利,雅尔塔两极体系取代了战前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这使中国革命出现新的契机,中国共产党抓

住机遇,领导中国人民打破了雅尔塔体系强加在中国身上的桎梏,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次转折是在世纪之交,在多极化、全球化、科学技术发展高速化、综合国力竞争白热化的世界大转折中,中国的大转折不断深化,改革开放深入发展,中国更深地融入到世界体系之中,中国的发展已经离不开世界。新一轮的中国大转折,按照邓小平的说法,是“四个没有过”:一是马克思没有说过,二是前人没有做过,三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干过,四是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没有出现。因此,这是一场前无古人的伟大革命,无论在政治、经济方面,还是在人们的生活方式、思想方式方面,都发生了并将继续发生非常深刻的变化。中国的大转折不仅决定中国未来的命运,而且也影响着世界的未来。现在国际上有两种极端的看法,一是“中国威胁论”,一是“中国崩溃论”,二者虽各执一端,但共同点却是对中国未来的关注。目前,国际上对中国未来的关注和判断,已成为一门显学。

古人说:“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那么,什么是全局呢?我以为就是世界大转折和中国大转折。这两个大转折所包含的两个趋向,即主流与支流、正面与负面、成功与挫折、机遇与挑战,以及其他诸多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都会同时反映到人们思想上,而且会在不同的人们中间产生种种不同的反响。可以这么说,当今世界和中国凡属带有重大原则性质的种种问题,归根到底,都离不开世界大转折和中国大转折这个全局。因此,处在中观层次上,无论是领导者,还是理论工作者,都必须具有全局的眼光,必须时刻关注中国和世界的变化。

在朋友的鼓励下,今年春节以后,我开始着手选编自己近年来发表过的有关中国宏观战略及国际问题研究的文稿。用了3个月的时间,终于编完这些文稿。此后,确定这本书的书名费了一番心思,最终选定《关注中国与世界》,初衷在于要把自己在“从全球着眼,从地方入手;放眼看世界,收眼看自己”的学术理念指导下形成的一些理论思考,奉献给培育我的上饶市委党校以及党校的各位领导、前

辈、同事和学员,以回报他们长期以来对我的关心、理解、帮助和支持。虽然这本书只是我的一孔之见,浅陋之处在所难免,但可以告诉读者的是,这绝不是一本应景之作,而是自己学术人生的一个阶段性总结。

这本书从酝酿到出版,得到江西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彭新元先生的悉心指点和热情鼓励,责任编辑龚平如先生、美术编辑蔡二弘先生以高度负责的精神为本书精心审稿、精心设计,我的同窗好友、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学者邓虹研究员欣然为本书作序,中共上饶市委党校夏群英、瞿宏毅承担了书稿的打印工作。在本书付梓之际,我衷心地表示感谢。

最后,我要深深地感谢我的妻子丁萌,没有她 20 年来对我的研究给予的全力支持和做出的种种自我牺牲,我就无法进行大量资料的搜集、思考、研究并写出此书。她作为一名眼科医生,不仅是在为我做出牺牲,而且也是在为理论工作做出默默的奉献。

2003 年 6 月 18 日

第一篇

国际战略

中间地带理论,两类矛盾、三种力量的观点,一条线、一大片的策略,三个世界理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关注世界、融入世界体系的历史由此而起步。

从中间地带理论到三个世界理论的演变^{*}

从‘中间地带’理论向‘三个世界’理论的发展,是毛泽东当代国际战略思想活动的重要内容。研究毛泽东这一战略思想的发展轨迹,对于我们全面正确地认识战后毛泽东的国际战略思想和当代中国的国际战略,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中间地带理论的提出

“中间地带”理论最早出现于 1946 年 8 月毛泽东与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这是毛泽东在对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苏关系便由战时的同盟关系变成了战后的敌对关系。美国迫不及待地推行称霸世界的计划,要全世界都向它“门户开放”;而苏联则坚决不让美国再往苏军所及之处插手。因此,美国把苏联视为它建立世界霸权的主要障碍,对苏联采取了以金元外交和原子外交为基础的强硬政策,声称在一切与苏联有争议的问题上美国要持坚定的立场。1946 年春,美国政府接受了乔治·凯南提出的“遏制”理论,一方面利用苏联与伊朗及土耳其之间的争端大造反苏舆论,极力渲染“共产主义正向全世界范围内扩张”,号

^{*} 此文第二部分原载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党史研究与教学》2000 年第 2 期,第一、三部分为新增内容。

召欧洲国家联合起来共同抵御苏联和其他国家“共产党势力的扩张”另一方面加紧进行反苏、反共、反人民的战争准备,鼓吹“美苏必战”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的论调,在欧亚两洲制造紧张空气和战争危机,在中国支持蒋介石反动集团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全面内战。对此,国内有些同志特别是一些中间派人士过高地估计了美蒋反动派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人民的力量,惧怕美帝国主义,惧怕爆发新的世界大战,因而在美蒋反动派武力进攻的面前表示软弱,不敢坚决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甚至有的人还主张对美蒋反动派采取妥协退让的政策。与此同时,苏联领导人对形势也作了悲观的估计,他们认为,国际形势相当严峻,世界大战不可避免,中国如果打内战,美苏可能卷入,中国将成为世界大战的战场,中华民族就有毁灭的危险,所以,中国共产党应该解散自己的军队,加入蒋介石的政府。

正是针对国内外一些人的惧怕心理和妥协论调,毛泽东提出了“中间地带”理论:

第一,对战后初期世界政治力量进行了科学的划分。战后初期世界政治力量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一是美国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机会,实力迅速膨胀,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原来的几个世界大国,或因战败,或因遭受战争破坏,都成了惟美国马首是瞻的二流国家;二是社会主义苏联因在二战中发挥了突出的作用,军事实力增强,政治影响大增,成了惟一能与美国抗衡的世界强国三是世界上出现了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对抗局面四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尤其是亚洲地区反帝反殖斗争风起云涌。根据这些变化,毛泽东把战后初期世界政治力量划分为三个方面,即美帝国主义为一方,苏联为一方;“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包括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为第三方⁽¹⁾。毛泽东认为,美国是世界的反动力量,是战争力量,苏联是世界和平的保卫者,是阻碍美国反动派建立世界霸权的强大因素,包括欧、亚、非许多资

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在内的中间地带国家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

第二,揭露了美国反苏战争宣传的实质。毛泽东指出美国的反苏战争宣传和其他的反苏宣传,确是反苏战争的政治准备,但另一方面“这种宣传,是美国反动派用以掩盖当前美帝国主义所直接面对着的许多实际矛盾,所放的烟幕”⁽²⁾。美国反苏战争宣传的实质,就像当年希特勒和日本军阀把反苏的口号作为侵略其他国家的托辞一样,是要向广大中间地带国家“扩张它的侵略势力”。

第三,指出了中间地带国家在维护世界和平、制约世界大战爆发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毛泽东指出,中间地带国家正受到美帝国主义的压迫和控制,这就决定了中间地带国家与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中间地带国家之前,就不可能进攻苏联。只要中间地带国家和人民团结起来,同美国反动派及其在各国的走狗进行坚决的和有效的斗争,第三次世界大战就可以避免。

毛泽东的“中间地带”理论紧紧地抓住战后初期国际战略全局的本质联系,科学地划分了世界政治力量,揭露了美国反动派的侵略本质,正确地分析了世界大战爆发的条件,从而鼓舞了世界人民的革命斗志,消除了一些人存在的惧怕心理,为中间地带国家和全世界人民团结一致,反对美国反动派及其在各国的走狗的进攻⁽³⁾,提供了思想武器,为中国人民打败蒋介石反动派、夺取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中间地带理论的重大发展

1947年9月,欧洲共产党情报局成立后发表宣言,宣称世界上已形成了以苏联为首的民主反帝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在年底召开的中共中央十二月会议上,毛泽东表示接受“两大阵营”的提法⁽⁴⁾。此后将近10年,毛泽东没有再使用“中间地带”的概念。但这并不意味毛泽东改变了他对“中间地带”的认识。事实上,中国

革命胜利以后,毛泽东不仅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仍把‘中间地带’理论作为对世界进行战略划分的指导思想,而且他还随着世界形势的变化,不断地丰富和发展了‘中间地带’理论。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国际斗争的一些重大事件,引起毛泽东的极大关注。一是美国在反共的名义下更加疯狂地对亚非拉民族主义国家和地区进行渗透和侵略扩张,例如,美国公然破坏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协议,以反共为名竭力干涉印度支那各国的内部事务,在中东实施‘艾森豪威尔主义’,搞所谓的‘填补真空’和直接武装干涉。二是民族主义国家开始登上国际政治舞台,其表现是 1955 年 4 月在印尼万隆召开的第一届亚非会议,这是取得民族独立的亚非国家第一次在没有西方殖民国家参加的情况下,讨论与自己切身利益有关的国际问题的大型国际会议,参加会议的 29 个亚非国家中,新独立的民族主义国家占一半以上,它们在会议上独立地发表了自己对国际问题的见解和主张,强烈地表达了自己要求独立和平等的愿望。三是 1956 年 10 月发生的苏伊士运河事件。这是埃及人民为维护国家主权和保护国家利益,同英法殖民者发生的一次直接军事对抗事件。这些重大事件对战后世界政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毛泽东由此而重新提出了‘中间地带’理论,并对‘中间地带’有关问题形成了新的认识。

第一,毛泽东认为,美帝国主义反动集团喧嚣反苏反华反共的真实意图是夺取‘中间地带’。1957 年 1 月,他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帝国主义现在是假借反共产主义之名来争地盘。争什么地盘呢?争亚洲非洲十亿人口的地盘⁽⁵⁾。”1958 年 9 月 8 日,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说,现在五大洲,除了澳洲,四大洲美国都想霸占住;“我总觉得,它是霸中间地带为主”⁽⁶⁾。他还指出,美帝国主义他们结成军事团体,他们的锋芒指向哪一边?是向社会主义进攻,还是向民族主义进攻?我看现在是向民族主义进攻⁽⁷⁾。

第二,毛泽东针对苏伊士运河事件,提出在‘中间地带’除了帝国

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之外,还存在‘两类矛盾,三种力量’的观点。‘两类矛盾,一类是帝国主义跟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即美国跟英国、美国跟法国之间的矛盾,一类是帝国主义跟被压迫民族之间的矛盾。三种力量,第一种是最大的帝国主义美国,第二种是二等帝国主义英、法,第三种就是被压迫民族’⁽⁸⁾。

第三,毛泽东对作为‘第三种力量’的民族主义国家的性质和作用做出了新的分析。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讲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不可能出现基马尔式的土耳其,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要就跟帝国主义走,要就跟社会主义走,没有第三种情况。1958年,毛泽东开始改变了他的这种估计,他认为,中间地带的许多前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获得独立以后,既不属于帝国主义国家,也不属于社会主义国家,其性质是民族主义国家。这些国家既不站在帝国主义一边,也不站在社会主义一边,而是站在中立的立场;‘第三种立场可以维持相当的时期,维持到还有必要的时候’⁽⁹⁾。民族主义国家作为对立的两大阵营都要争取的中间力量,由于长期饱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侵略、压迫和剥削,因此它们在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侵略、压迫和剥削方面,与社会主义阵营的政治目标是一致的。这就使得民族主义国家这股独立于两大阵营之外的“第三种力量”有可能在政治上倾向于社会主义,能够在国际斗争中成为社会主义的同盟军。处理好同这些国家的关系,加强同它们的团结与合作,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毛泽东的上述新认识和新分析,值得我们给予足够的重视。因为毛泽东紧紧地抓住‘中间地带’这个当时世界斗争的重点问题,揭示了在那里存在的‘两类矛盾,三种力量’,并由此而对作为‘第三种力量’的民族主义国家进行了重新定位,这表明他的‘中间地带’理论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经历了一次重大发展,开始进入了向‘三个世界’理论转变的最初阶段。

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毛泽东的‘中间地带’理论再次有了